

译者前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地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统治和治理的主体、结构、方式、过程和意义。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政府体制和政治过程，特别是对 17 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近代以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民族国家建立在众所周知的三要素之上：领土、主权和人民。任何独立的政治体要成为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土，国家的领土是独立而不受侵犯的；在这个独立而确定的领域中必须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机关，它代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主权不可分割，不受他国的干预；在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公民，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仅受本国法律和本国政府的保护，他们只有在隶属于一个领土国家时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力，因而公民通常等同于国民。直到现在，这样的民族国家仍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人们政治想像的基本依托所在。然而，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形象。

全球化挑战主权国家的现实，必然地导致人们对传统的主

权国家观念的重新思考，传统的国家理论因而也受到了严峻挑战。到目前为止，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者至少提出了以下五种不同观点：第一，传统的国家主权已经开始彻底崩溃，民族国家已经开始终结，国家主权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国际政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经来临。第二，全球化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世界主义”时代，在世界主义时代，不管主权是否存在或是否仍然发生作用，就其重要性而言，它都开始让位于公民的人权，公民个体的人权获得了高于国家主权的地位。第三，民族国家的主权确实受到了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也确实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但国家主权远没有消失，它依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核心和基础。第四，“民族国家的终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全球化不仅没有使国家主权消失，甚至也没有使其弱化；相反，国家主权的属性和功能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第五，不可让渡、不可转移的传统国家主权正在被新的主权形式取代，国家主权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变得可以让渡和转移。国家主权正在多元化，向上它部分地被转移到了国际组织、跨国组织和区域组织，向下它部分地被转移到了地方和社区。

国家理论与现实政治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总是以某种国家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不管理论家的初衷如何，一种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国家理论或多或少会对政府的政策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仔细地研究可以发现，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做的一些重大调整与上述新的国家主权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必然结果；所谓的先发制人战略，就是无视国家主权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自然延伸；所谓的全球治理战略，就是世界主义理论的逻辑要求。当然，真正的学术研

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决不是庸俗的、简单的等同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在提出其新的国家观时，主要是出于学术的动机，因为及时地对现实的变迁作出理论的分析 and 概括，这本身就是学者的重要职责。我们想要说明的是，无论学者如何坚持“价值中立”，任何国家理论都必然会有其现实的关联，或多或少会受到作者所处的国家、地位、立场和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影响。因此，对于本书所要介绍的各种新的国家主权理论，读者应当分别从理论本身的逻辑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两个方面去分析和理解。下面，我们依次摘要介绍本书所收各章的主要观点。

1、全球化与国家

作为一名左翼学者，利奥·潘尼奇在《全球化与国家》一文中不仅对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而且论述了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应当采取的战略策略。

潘尼奇指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左翼学者采取了一种错误的策略，即把自己对全球化的反思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遵循着资本主义的逻辑。大多数左翼学者把全球化解释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以前的左派似乎可以通过在民族国家的地形上奔跑而到达别的终点；然而现在，由于资本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所以左派不得不学会跟资产阶级一起在全球的地形上奔跑。潘尼奇批评说，实质上，左翼学者的这些反思充其量只能是“如何抓住资产阶级的的手、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以至赶上当代资本主义变迁的步伐”。他说，倘若左派要重新组织有效的运动，那么他们不应该是跟上或适应资本主义变迁的步伐，而

应该是发展自己进行广泛和有效动员的能力，以对抗竞争和利润的逻辑，从而使自己最终能够在资本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建立一种平等、协作、民主的社会秩序。如果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展，那么即使以加倍的速度前进，也根本无法到达别的终点。

多数左翼学者把全球化假设为一个资本藉以限制、逃避或超越民族国家的过程。潘尼奇认为，这种假设可能会在两种意义上产生误导：首先，它往往过高估计了民族国家在较早的时期里控制资本的能力；它似乎认为左派的实践模式在民族国家是完全有效的，由此鼓励在全球层次上也采用相似的模式：这仅仅是一个在新的地形上跑得更快的问题。其次，即使是那些没有这种错觉的人，也常常会忽视一种事实，即：今天的全球化既是国家的产物，并且也在根本上重组而非回避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导致了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之间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使左派没有注意到，不仅需要改变自己的国家战略，也需要形成适当的国际战略。

潘尼奇争辩说，任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左派战略进行重新评估的尝试，都必须以下面的认识作为前提：在全球化时代，虽然国家干预的本质已改变了许多，但是国家的角色未必就已经销声匿迹。全球资本主义并没有绕过国家；相反，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仍然相当活跃，资产阶级依然高度政治化。他说：对于这种过程，我们可以用一种类似于理解国家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作用去加以认识。在“自由放任国家”的出现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一种十分活跃的角色，从而使政治从经济中分离出来，并在法律上与政治上保证了契约权和财产权。现在我们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情况：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借助国家的支持才得以发生的过程；国家赋予全球化以意义，在一些重要的

方面甚至还创造着全球化；全球化包含了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转换，这种转换经常体现为国家权力的集权化和集中化，它们是全球市场规则的必要条件和伴随物。跨国资本所引起的权力集中并没有减损国家的权力；相反，“国家恰恰介入了这一集中的过程”。

针对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被全球化所超越了，因而需要引入一种“跨国民主”的观点，潘尼奇指出，这种观点误解了“国家的国际化”所包括的真实含义。其实，不仅世界仍主要是由国家组成的，而且任何跟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权力相关联的民主，也依然是嵌入在以国家或小于国家的单位为界限的政治结构中的。他还进一步指出，那些倡导“国际公民社会”和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并没有逃离国家；相反，国家一直是现时代资本主义扩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组成因素。据此，潘尼奇得出结论说：左派应当把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重点，放在国家的转型上，而不是超越国家或试图缔造一种进步的竞争国家。必须寻求国家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能力的转变，并使这些能力服务于最终实现普遍的、平等的和民主的目标。

2、全球化与‘无权力国家’的神话

当代西方的主流全球化理论断定，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民族国家的权力正在日益弱化，一种“无权力的国家”（Powerless State）正在出现。对于这一断言，琳达·韦斯给予了坚决的反驳。在论述“无权力国家”时，她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民族多样性消亡的说法基本上是一种误导，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神话；与此相反，她力图证明：当今的国际经济实践

并不足以证实使得本土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的全球市场已经产生 从而不足以支持‘跨国趋势’的理论。

琳达承认，国家的结构和职能在当代世界确实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她认为所有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国家的性质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是因为国家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发生了变化。在琳达看来，国家的作用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并没有被削弱 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国家权力在新国际环境下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她以东亚的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为例，来说明这样一个完全与主流理论相反的观点：强有力的国家正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关键性力量。“全球化”往往是国家在推进其公司国际化战略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它有时就蕴涵在国际化的国家能力中。

琳达还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论证“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她说：从全球流动的规模上讲，1913 年以前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同战后及最近期间的流动并无二致。大量的研究同时表明 在某些方面 早期国际开放的水平并不比今天逊色。对一系列工业化国家而言，1913 年的出口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 1973 年所达到的水平。更有甚者，在战后，尤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贸易一体化的趋势一直在减弱。尽管世界贸易比产出总量要增长得快得多，但它的增长实际上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一直在减慢，其比重从 1965—1980 年的 1.65 下降到 1980—1990 年的 1.34。

根据琳达的研究，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恰恰是与全球化趋势相违背的，我们所处的世界与其说是国家间差别基本消失的“全球化的世界”（the Globalized World）还不如说是国家

间的差别依然十分突出的“国际化的世界”(the Internationalized World)。世界经济是一种国际化的经济,一种不断区域化的经济,而不是“国界和地缘在经济拓展中变得无足轻重”的全球化经济。首先,从生产的国内基础来看,即使我们承认,通过贸易和投资流动,民族国家的经济比过去更加一体化了,但在所有的(除了规模最小的)国家经济中,贸易只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小的一部分。在日本、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其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甚至更少。这意味着,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经济中,大约 90% 的产值仍是由国内场所消化。由此看来,生产的国内基础依旧像过去一样重要。其次,从南北差异来看,一方面,全球化预示着北方与南方更加均衡地发展,而事实上,世界贸易、生产和投资仍高度集中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也就是说,集中在富裕的北方。从 1970 年到 1989 年期间,北方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 81% 上升到 84%。投资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在同一时期,大约 90% 的投资流向北方国家。最后,从区域化程度来看,以北方占主导地位的贸易和投资自身也变得日益集中,形成区域内向发展模式。比方说,现在,欧洲内部国家彼此间的贸易大约占其总出口贸易的 62%。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区域内贸易,相对于美—日和美—欧贸易总量,其比重从 1980 年的 68% 升至 1992 年的 79%。

对于“无权力的国家”理论,琳达提出了三点强有力的批评:第一,这一理论过分夸大了早期国家的权力。全球主义者往往通过夸大国家以往的权力,来表明当今国家权力的式微。第二,过分夸大国家间反应的一致性。琳达看到,并非所有的政府都追随新自由主义教条,除了东亚的 NICs 外,德国和日本也远离凯恩斯主义。第三,这种理论过分强调政府的无能为力。琳

达自己的结论是：在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差别似乎更显著了，而不是相反，因而，它加剧，而不是缓解了目前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差距。变化了的国家作用同 18 世纪自由主义分子所直面的国家作用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就是：不存在某些全球主义者所断言的国家权力的衰落，而不过是一种严格限定了的国家权力。民族国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更为关键；它不仅不会阻碍世界经济，反而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同国家体制变革的进程是国家的适应性不断发展的进程，而不是向新自由主义单一模式趋同的过程。

3. 全球化与社会国家

与上述两位左翼学者一样，戴维·阿姆斯特朗也试图挑战下述这种论点：全球化进程正在威胁国家主权，使国家主权变得毫无意义。在《全球化与社会国家》一文中，阿姆斯特朗运用建构主义的方法，提出了“社会国家”概念，并得出了全球化进程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增强国家主权的结论。

阿姆斯特朗赖以建构其“社会国家”观的理论前提，是把国家也看做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国家不仅是一个法律实体，也是一个社会行动者，能够通过其独特的主体间社会化过程，来认知、学习、评估、安排并处理所有事情。正像国家内部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具有主体性一样，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具有独立的主体性。任何社会在给予其成员主体性意义和认同时所扮演的角色，国际社会相对于其成员——国家——也具有同样的角色。国家应被视为国际背景之下同时具有社会性和自利性的实体，其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有助于确定和维护国家的认同，同时也会影响和改变这种认同。正像国内社会中每

个成员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斗争一样，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也都在最终围绕主权和期望获得主权国家资格而展开斗争。这些斗争表明了国家主权的可欲性和重要性，它最有说服力地证明全球化力量尚未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或毫无意义。

阿姆斯特朗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为其建构主义的社会国家理论进行辩护：第一，把国家比喻为社会行动者具有分析上的益处。尤其在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比喻能将其他情况下不可能的复杂现实缩小到可以控制的范围。第二，这一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与现实相吻合，虽然并不完美，但已足够证明其应用的有效性。第三，国家被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和公众所具体化，它们在国际关系的交往中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例如，美国同日本的关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可能是由不计其数的团体和个人所代表的很多不同观念、利益和行动所构成的，每个国家都被另一个国家的个人设想为具有某种共同的特性。个人尤其是那些负责对外政策者，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上述相互认知的原因，接受了别人赋予的角色和特性：他们自认为代表自己的国家行事。

阿姆斯特朗最后指出，那些贬低国家重要性的全球化理论家所犯的根本错误，是将全球化视为巨大的、相互关联和不可阻挡的力量，而国家则是孤立的个体，在全球化这种无比强大的进程面前显得极其脆弱。但是实际上，全球化面对的也是同样强大的相互联结的国家体系，这些国家通过与该体系所独有的规则和过程相一致的社会互动来相互学习并确认作为一个国家的意义。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国家面对强大的全球化力量所具有的持久性以及国际社会变化和转型的性质，只有在全球化和国家的不同特征以及两者的互动为人们完全认识之后，方可被充分理解。

4. 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

简·阿尔特·斯科尔特对“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无论是全球化的原因，还是后果，都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剩余积累的动力已经成为当代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特别是国家的活动方式。只有通过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对国家的深刻影响。

首先，资本主义助长了跨国关系的增长，以至于近几十年来各国的公司越来越追求全球销售的可能性。由于全球市场的扩展，分散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消费者可以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商品。其次，尽可能地减少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利润，这一资本主义动力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为了能够把生产部门设在劳动力成本、税收、管理制度和其他因素都最为有利的地方，企业推动了全球交往、组织、金融的发展。通过所谓的“全球资源”企业从世界各地汲取了它需要的原材料、资金、设备和服务。最后，由于在跨地域空间的追求中产生了更多剩余积累的机会，资本主义因此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逻辑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又同时在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斯科尔特指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跨国界关系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重心正在从“货物”（传统的贸易和工业）转向“无形产业”（金融、信息和通信）。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变化是跨国公司的兴起。它们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跨越了距离和国界。对资本主义来说，全球化的最后的和十分重要的后果是货币与特定的领土空间的分

离。

在斯科尔特看来，全球化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传统的国界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着国界这一主题，国家管辖范围的界定及相关的统治、经济、认同等问题也显得十分突出。斯科尔特从国界这一主题出发，概括了理解“全球化”概念的三种流行观点：第一种观点把全球化等同于一种穿越国界关系的增长；第二种观点把全球化当做开放国界关系的增强；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跨越国界关系的增长。斯科尔特说，虽然这三个概念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在性质上有不同的侧重。当从穿越国界（Across-Border）交换的扩散这个角度来理解时，“全球化”和“国际化”实际上是同义词。的确，政界、商业界和新闻界的许多人都是在可以相互交换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他们用“全球化”来表示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商品、投资、人才、货币、信息和观念的互动。在这种观点看来，全球十分巨大的互相联系只不过意味着国家之间日渐加深的互相依赖。“全球”贸易仅仅是数量巨大的“国际”贸易等等，不一而足。

斯科尔特承认，全球化这种跨地域现象的兴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可谓举目皆是。他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描述作为超国界的全球化进程：第一，在通信领域，飞机、电话、计算机网络、无线电通信和电视等媒介让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相互之间几乎可以直接进行联系，不管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地域距离和国界。第二，在组织机构方面，20世纪晚期，跨国协作的商业企业、市民协会和协调机构迅速地扩张。第三，从贸易方面来说，今天许多国家间的货物和服务往来都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市场行为。第四，就金融来说，随着各种各样的货币和金融中介在一刹那间通过电子形式流通于世界各地。第五，就生态而言，20世纪晚期人类环境遭受的大量的人为改变并不受距离或国界状况的限制。

第六，就认识来说，全球化已深入人心，人们把这个世界看做是地球村，认为自己是跨国界的共同体的一员。

上述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呢？斯科尔特认为至少对现代国家产生了七个方面的影响：第一，面临着资本的全球化，国家仍然存在，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灭亡的命运。第二，跨国资本和全球化的其他方面的共同作用，剥夺了当代国家的主权。第三，除传统的国内公民外，跨国资本还赋予当今国家某些跨地域的支持者。第四，跨国的剩余积累过程极大地抑制了国家间的战争。第五，跨地域的资本主义通常增加了当代国家削减社会福利的机会。第六，资本的全球化促进了国家间多边主义史无前例地发展。第七，为国家民主的实现带来了重大的困难。

虽然斯科尔特承认在面临全球化冲击时国家仍然将得以维持，但他认为这并不表明国家的永恒性。因为在他看来，作为国家最主要特征和属性的主权，正在随着全球化的兴起而逐渐消失。在受到全球化进程冲击之前，传统的国家主权，在其管辖的领土范围内是至高无上的、全面的、惟一的。换言之，主权国家有着最高的权力，它统治着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并不与其他国家或其他统治中心分享其权力。然而，主要地归因于跨国资本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在 20 世纪晚期已经变得彻底不切实际了。斯科尔特举例说，在全球化加速发展时期建立的大多数新兴国家，除了名义上的主权外，从来就没有享有过真正的主权。主权国家必须要有领土，也就是说，要有对发生的事件具有管辖权的固定地盘，或在这个指定地方它可以严密地巡视边界。然而，像电子货币和跨国生产线一样，全球化进程不可能限定于某个地区，在那里这个国家可以行使其最高权力和独一无二的管辖权。的确，许多国家的政府领导都经常重申“捍卫主权”；然

而，主权已经不再在其本来的意义上得到捍卫。现在，“维护主权”这一呼吁通常并不是主张绝对的、全面的、单边的国家权威，而是指国家在某个特定的控制区保持其影响力。

斯科尔特进一步提出，正是跨地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现代国家失去了主权这一首要的标志，也就是说，失去了对国家货币和相关的金融市场的彻底的、惟我独尊的控制。全球资本的许多具体形式也轻易地压倒了国家的主权。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条件下，主权消失了，现代国家也已失去了单方面实行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这种放弃有时还需要在国家之间（如通过七国集团）分配宏观经济任务，在其他情况下还涉及对地区和世界范围的跨国家机构的某些责任的转移。实际上，有七个国家的宪法明确地规定了在区域协作利益上的主权让渡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宪章要求其成员国努力改变它们的法令和程序，以适应世界贸易法；在贸易争论中，当世贸组织的法规与某国的法规矛盾时，也是有效的，除非所有的成员国都表决推翻这项判决。现在，许多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环境有关的决议都是通过上述的这种或那种方式，而不是通过国家达成的。当然，表面说来，国家在这些情况下都“自愿地”放弃了主权。然而，资本全球化的力量大大地制约着国家，迫使它们做出这种“选择”如弱小国家为了获得外国直接投资和贷款，它们往往特别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批准。

斯科尔特强调指出，国家主权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国家本身的终结，国家在资本的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并且正在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作为国家失去主权这一最重要的属性，其性质、职能和活动方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例如资本主义的传统民主模式将失去其现实的基础，福利国家将逐渐萎缩，多边主义将得到空前的发展。

5、民族国家的终结

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者在全球化与国家问题上，基本上对民族国家持否定的态度，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就明确无误地断定“全球化已经开始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他说，作为 18、19 世纪的产物，现代民族国家本身也已开始趋于瓦解。就真正的经济活动流动而言，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其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参与者的传统地位。

大前研一说，在全球化时代，长期形成的民族国家这一基本政治单位很少再有什么贡献；相反，在推进整体经济福利的愿望驱动下，维护传统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已经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他论证说，就全球经济而言，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参与者。在重商主义时期，它们是独立的、强有力的、高效的，是创造财富的带头人。但是最近，由于选举政治不可逆转的衰落大大地束缚了经济发展，它们变成了财富分配最无效的动力。产品的国别意义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不再那么重要，人们购买的通常是不在本国生产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总之，在大前研一眼中，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管理经济事务的过渡性组织形式，国家主权对经济的繁荣已经成为一种极大的阻碍。因此，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人们怀旧的幻想。

像西方极右派学者一样，大前研一也公开主张应将弱小国家的自主权让与列强国家。他说，在今天的无国界经济中，随着经济在国界间的迅速流动，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有一种选择可以抵消经济恶疾的形成；只有一种政策能够恢复连续的、自我强化的生命力；只有一种在道德上可接受而实践上又可行的、满足人民近期需求而不是向孩子们许诺美好前景的方法。这就是，将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转让给那些创造财富的区域国家，促进这些

区域国家努力寻求全球性的解决办法。他把从民族国家走向所谓的“区域国家”看做是人类目前的“惟一希望”。

6、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未来

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逊一起合作，发表过许多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流行的全球化理论提出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从经济上说，世界经济仍然是一个国家间的体系。从政治上说，尽管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已经被大幅度削弱，但它仍然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角色，他们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1）国际经济与超国家的全球化经济模型并不一致，民族国家在国家和国际层次的经济治理过程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2）新的国际市场治理形式和经济活动仍然与民族国家直接相关，但对它的角色要求是全新的；国家的传统“主权”职能正在逐渐削弱，而代之以一种新的“主权”（3）尽管国家对领土的排它性控制被国际市场和新传播媒介削弱，但它依然在确保领土控制和人口规制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人口要比货币、商品或观念缺乏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仍然是“国家化的”（Nationalized）依赖于护照、签证、居住地及劳动资格证，没有任何别的机构能够取代他们。（4）虽然国家不再能够垄断所有治理职能，但在各种层次和各种类型的复杂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其中仍然拥有独特的、重要的和持续性的作用。（5）从国际层面看，民族国家也是所有国际规制的合法性源泉。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国际法就不能运行。

在坚持民族国家依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基本政治单位的同时，赫斯特和汤普逊特别提醒大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

家作用在某些领域确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控制民众和国内社会活动的能力也随之下降。首先，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家的战争行为上。核大国放弃了传统“主权”的实质性衡量标准——它们通过条约创建世界文明秩序，不仅限制战争，而且允许其他国家的检查和监督、军事部署告知等类别的权力，致使有效的战争动员难以成为可能。赫斯特和汤普逊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生活于和平世界。小国会彼此开战，发达国家也会受到恐怖主义威胁。革命运动在贫穷的外围国家会继续高涨。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变得无关紧要，但是表明垄断特定领土内合法暴力手段已不再对它们的存在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其次，也突出地表现在国内的各种治理活动中。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可能像过去垄断合法使用暴力一样垄断所有治理权力。实际上，国家层次的机构远远不能提供足够的地方性知识和有效治理，各种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国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同样分担着国家的治理权力。

赫斯特和汤普逊认为，国家仍然保持“主权”，但这种主权并非是在其领土范围内是全能的或至高无上的，而是指国家仍然保持着领土的管辖权，它们在其边境内仍是居民的代表。所以这是一种新的“国家主权”，它可以分割和让渡。国家主权“向上”转移，指的是通过国家间协定建立和遵守各种形式的国际治理；“向下”转移指的是国家对其领土内中央、区域和地方政府以及公民社会中得到认可的私人治理间的权威与权力关系的宪法秩序调整。但是，当国家转让其传统的主权时，国家同时也获得了新的角色。

7、世界社会与民族国家

约翰·迈耶、约翰·博利、乔治·托马斯和福兰西斯·拉米雷斯确信存在着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奠定了全人类趋向一体化的世界社会和世界模式的现实基础。他们试图从世界社会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中来理解民族国家的演变。他们首先假定：当代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都是从世界模式中衍生出来的，而后者又源自于全球文化和交往的发展过程。这些模式及其所反映的目标，例如平等、社会经济进步、人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和明白无误的，并且常常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世界模式还决定着民族国家的结构与政策。他们认为世界文化的同构性，决定着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有巨大差异的民族国家日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强调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宪政体系，以课程教学为核心的大众教育系统，旨在促进国家发展的低出生率人口控制政策，倡导男女平等，总体上不断扩大的人权，日益重视对环境的保护，以发展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普遍的福利制度，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等。

他们进而通过自己独特的解释模型，详细论证了世界社会影响民族国家的三种基本途径或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世界社会影响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国家目标的确立。近代以后，民族国家都把主权的独立和外国的承认当做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这些目标正是主权认同的世界文化模式在各民族国家的具体体现。其次，世界主义影响对民族国家体制的维护。他们认为，当民族国家在实现其合法性目标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世界社会结构往往会提供帮助。例如，世界社会的意识形态都积极鼓励各国施行人口控制政策，就整个世界而言，该政策并无益处，但对国家发展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最后，世界社会影响次国家行动者的合法性及其实践。例如，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忽视了获得世界公认的政策，那么，各种国内力量将会推动国内政策